

从“青春变量”到“振兴增量”：共青团引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研究

李鑫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DOI: 10.61369/ETR.2026010032

摘要：青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锋力量。当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仍面临角色模糊、保障缺位、组织松散等结构性困境。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以共青团为主导，推动高校深度协同，通过构建互嵌机制、搭建协同通道、健全激励与保障制度、强化引领功能四大路径，系统激活青年参与的“乘数效应”。本文旨在回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的战略部署，为将分散的“青春变量”转化为可持续的“振兴增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共青团；乡村振兴；青年参与；协同机制；为党育人

From "Scattered Youth Variables" to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Increment": A Study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Guiding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Li Xi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Abstract: Youth are the vanguard force in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Currently,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ill faces structural dilemmas such as ambiguous roles, lack of safeguards, and loose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ake the leading role to promote in-depth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Through four major paths—constructing an embedding mechanism, building collaborative channels, improving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iding function—it systematically activates the "multiplier effect" of youth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spond to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garding "promot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and encouraging various talents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for service,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ransforming scattered "Scattered Youth Variables" into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Increment".

Keyword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rural revitalization; youth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Party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在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强调“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2]，并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3]，要“让更多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5]（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为新时代青年投身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制度指引。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肩负着“为党育人”的根本任务，如何引领青年投身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决策部署，让青年在振兴实践中成长成才，也就成为共青团发展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三重逻辑：共青团引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必然性分析

共青团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具有深

刻政治逻辑、现实基础与发展价值的战略安排，体现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共青团的使命担当。

（一）政治逻辑：履行政治责任的时代必然

这一政治逻辑根植于党的根本宗旨与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建

作者简介：李鑫（1989.01—），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在读，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团委书记，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邮编：710127。

议》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6]，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共青团必须主动将青年力量嵌入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治理大局，让青年成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重要力量。从历史维度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始终是共青团动员青年的价值主线；从现实维度看，共青团通过制度化渠道将青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践动能，是落实“党管青年原则”的具体行动。

近年来，“青耘计划”直播助农行动带动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超亿元；西部计划志愿者在贵州毕节推广猕猴桃数字化管理，助力亩产显著提升。这些实践彰显了共青团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站位，验证了青年力量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政治效能^[6]。

（二）现实逻辑：破解乡村困境的关键变量

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结构性困境：人口结构上，青年人口持续外流，人才断层日益凸显；产业结构上，传统农业占比高，产业融合度不足；治理结构上，村干部队伍老龄化，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人才制约。

青年以其数字素养、创新思维与市场意识，成为破解这些困境的关键变量。在浙江安吉余村，返乡创业青年运用新媒体技术将竹艺产品远销海外，带动周边农户增收；在云南剑川县，青年依托木雕、土陶等非遗技艺创立文创品牌，吸引大学生返乡就业。共青团组织通过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推动青年从个体创业转向集群发展，建立县域青年创业联盟，孵化涉农项目，带动农民增收。这种由共青团主导的“青年赋能—产业提质—农民增收”良性循环，正推动乡村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彰显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价值。

（三）成长逻辑：价值实现的双向奔赴

乡村振兴为青年提供了独特的成长场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7]。《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提出要鼓励青年在乡村振兴中施展才华，为青年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实践维度，乡村振兴场域为青年提供了全方位能力锤炼平台：在产业振兴中提升市场能力，在人才振兴中深化专业素养，在文化振兴中厚植文化底蕴，在生态振兴中培育生态文明理念，在组织振兴中锻炼治理能力。许多扎根乡村的青年通过团组织推荐获评“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获得创业贷款与导师辅导，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这种通过共青团组织搭建的成长通道，使青年在服务乡村中实现身份认同的升华——从“外来者”到“新乡贤”，完成了个体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8]。

这三重逻辑构成有机整体：政治逻辑确立行动合法性，现实逻辑验证实践有效性，成长逻辑保障发展持续性。三者共青团组织架构中实现辩证统一，使青年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制度性耦合，既彰显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又回应青年的时代需求，实现了组织使命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二、现实梗阻：青年深度参与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共青团引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取得一定成效，但深层次

的结构性梗阻依然制约着青年在乡村的持久扎根与价值实现。

（一）育人导向与乡村需求的结构性错位

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需求之间存在深刻的价值导向错位。课程体系设置上，涉农课程占比普遍不足，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农业技术等核心内容缺乏系统整合；实践教学安排上，短期参观式体验多，深度参与式实践少，学生难以建立与乡村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高校评价体系将论文发表、学术成果产出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对服务乡村基层的社会价值创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此种导向下，青年对乡村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帮扶对象”或“体验场所”层面，难以形成“建设主体”的身份认同，继而导致即使有青年短期下乡，也因价值观念与能力结构不匹配而难以持久。

（二）资源整合与对接机制的制度性短板

乡村资源与青年创新力量之间的对接低效，源于制度性协同机制的缺失。一方面，乡村资源呈现高度碎片化状态，分散在农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缺乏系统整合与价值转化；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成果与青年创新项目因缺乏精准匹配平台而难以落地转化。当前共青团组织的资源整合工作，往往停留在举办对接会、发布项目清单等表层操作，对接重资金轻后续，缺乏持久性的制度保障。其中的关键在于，高校、地方政府、共青团、企业等主体之间权责边界模糊，合作依赖个人关系和临时协议，缺乏契约化、法治化的责任共担机制。当青年发现自己的创新设想难以在乡村落地生根，参与热情自然也会消退。

（三）发展保障与成长通道的系统性缺失

青年不愿长期扎根乡村，根本在于制度性机会成本过高。在职业发展通道上，基层工作经历在公务员招录、职称评定、社会认可等方面的转化机制不健全，青年担忧“下去容易上来难”；在生活保障体系上，乡村在住房、医疗、教育、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上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尤其对已组建家庭的青年形成硬性约束；在风险抵御能力上，涉农创业面临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多重风险，而现有保险与补贴政策覆盖不足、响应滞后。更重要的是，当前激励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部门之间政策不衔接、短期与长期政策不配套、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不平衡。这种系统性缺失，让多数青年在职业规划中仅将乡村视为过渡性选择，而不是长期发展的平台。

（四）组织形态与青年流动的时空错配

传统团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边缘化，本质上是组织形态与青年流动规律不匹配的结构性危机。空间布局上，基层团组织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置，未能跟随青年向产业园区、电商平台、创业集群等新型空间流动的趋势，组织覆盖与青年聚集形成“时空错位”；功能定位上，服务内容与青年发展刚需脱节——电商青年需要流量支持却得到文体活动，创业青年需要融资渠道却获得技能比赛，组织服务与青年需求之间出现“功能断层”；价值引领上，共青团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年实践割裂，缺乏有效载体，很容易陷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困境，无法将“国之大者”的政治要求内化为青年的行动自觉。这些错配使得共青团在青年中的存在感弱化，许多返乡创业青年甚至不知当地团组织

的具体职能，自然更谈不上服务保障引领作用的发挥^[9]。

上述问题表明，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障碍已超越资源短缺或意识不足的表层问题，深入到制度设计、组织形态与价值引领的系统性领域。破解这些困境，不能仅靠活动叠加或资源堆砌，必须推动工作范式从“项目驱动”向“制度赋能”的根本转型。唯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育人、平台、保障、组织四大关键环节，才能实现青年成长与乡村发展的价值共生，真正激活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动力。

三、路径探索：共青团主导下的制度化协同机制

（一）构建价值引领与能力生成的互嵌机制

浙江农林大学与团安吉县委共建“两山青年学院”的育人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学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等政策文本系统转化为教学模块，要求学生完成160小时乡村实践并通过村民评议方可获得学分。不仅使青年在真实场景中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实践内涵，有效破解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空心化”困境，更构建了高校育人与乡村需求精准对接的制度通道。结合《建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系统部署，共青团应主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进三方面制度创新：

一是推动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将服务乡村振兴纳入高校思政课程与实践教学的必修内容，并设置不低于总学分10%的乡村实践学分要求；二是推动建立校地协同育人实体化平台，由高校团委与县级团委联合成立具有独立运营能力的乡村振兴学院，通过法定章程明确双方权责；三是完善教师评价机制，将指导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实践成效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既能推动高校育人实践与乡村振兴大局的深度融合，也能实现青年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达成的同频共振。

（二）搭建“高校—地方—乡村”资源协同通道

乡村资源碎片化与高校技术供给离散化，导致大量创新成果难以转化。《建议》强调“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直指资源错配痛点。共青团应充分发挥政治枢纽功能，系统构建制度化的多维协同界面：

在县域层面，深入贯彻《共青团中央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要求，由县级团委牵头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化联盟组织，通过法定章程明确各方权责，整合涉农企业、合作社、创业青年等主体资源；在高校层面，持续推动教育部《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23—2027年）》落地见效，建立将成果转化实效纳入学科评估与教师职称评定的刚性机制；在数字治理层面，重点关注“创青春”等官方平台功能的升级，开发基于大数据的“需求—技术—资本”智能匹配系统，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同时，应持续推广团中央“百校联百县”青春建功行动的制度创新，依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校地合作协议”，设定高校年度技术服务人次底线与县域配套资金比例，确认双方权责边界和违约

责任。通过契约化、法治化的责任共担机制，不仅能解决资源对接中的“搭便车”问题，更构建了可持续的协同治理生态，将从根本上避免了“签约热、落地冷”的合作困境，使分散的青春创意得以系统整合为县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健全全周期激励与保障制度

青年群体不愿长期扎根乡村，本质是制度性机会成本过高导致的理性选择困境。《建议》提出要“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这就要求共青团协同相关部门，从制度设计上帮助青年丢掉选择的包袱^[10]。

在职业入口端，推动修订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意见》，将乡村振兴一线服务经历转化为实质性职业资本，对服务满2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报考县级以上机关职位时实行“笔试加分+面试优先”的双重激励机制；在能力提升端，推动构建乡村振兴青年人才专项培养计划，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青年参加现代农业技术、乡村治理等定制化培训；在生活保障端，推动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指导县域政府编制“青年人才安居工程实施方案”，通过改建闲置校舍、厂房等公共资产，打造集居住、创业、社交、托育于一体的青年人才社区。当制度设计能够系统性回应青年发展全周期需求时，乡村便能从“人才洼地”转变为“创业高地”，真正实现青年成长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共生。

（四）强化网络化引领功能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团组织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的“悬浮化”困境，本质上是组织形态与青年流动空间错配的制度化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重点，为组织重构提供了根本遵循。共青团应系统推进三重制度性嵌入，重构政治引领的毛细血管网络。

在空间嵌入维度，推动修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县级团委在青年创业园区、电商直播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体等新型经济空间设立功能型团组织，并将团组织议事规则纳入园区管理章程，实行创业青年骨干与团干部交叉任职机制；在功能嵌入维度，深化团中央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合作框架，扩大“青创贷”项目覆盖面，建立县级团委推荐责任制，对经审核的涉农创业项目，可适当提高授信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并加快办理进度。在价值嵌入维度，推动建立“百校联百村”校地团组织结对机制，由高校团委与乡村团组织共同设计“问题导向型”实践项目，将解决真实治理难题（如民宿环保标准制定、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价值引领的载体。这种制度化的三重嵌入机制，不仅推动共青团从“活动组织者”向“生态构建者”转型，更在青年与党的政治联结之间构建了制度化通道，使政治引领不再是悬浮于空中的口号，而是扎根于青年日常发展需求的生命线，从根本上重塑了新时代共青团在乡村振兴场域中的组织韧性与政治功能。

四、前景审视：潜在风险与未来展望

协同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多重异化风险，需要前瞻性

防范。机制空转风险表现为校地合作协议沦为“纸面工程”，需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将资源对接实效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挂钩，并引入青年满意度一票否决制。目标异化风险体现在部分高校将乡村实践简化为“盖章打卡”，应开发青年能力成长数字档案，追踪服务期满五年后的职业发展轨迹，用长期数据校正短期行为。资源依赖风险要求建立“财政引导+市场运作+社会捐赠”的多元资金池，创新“乡村振兴青年债券”等金融工具，对可持续项目设置3-5年的梯度退坡机制。数字鸿沟风险则需设置资源分配的“普惠性阈值”，如规定平台流量向百强村倾斜不得超过县域总额的30%，同时开发简易版数字工具适配老年农民需求。

面向2035年乡村振兴远景目标，共青团引领机制需分阶段推进：短期应协同教育部门完善实践育人制度设计，推动将乡村振兴服务经历纳入高校人才培养评估体系；中期着力培育青年主导的乡村产业创新生态，如浙江“青创农场”、四川“乡村青年创客空间”等试点已展现积极成效；长期需在文明层面重构青年

与乡村的精神联结，使参与乡村振兴成为青年价值实现的自主选择。

综观全文，共青团引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立足中国制度优势的创新实践。这一机制既不同于西方市场主导的个人选择模式，也超越了传统行政动员的单向路径，探索出政治引领、组织动员、价值实现相统一的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在于：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青年成长发展深度融合，使个人职业规划与乡土文明复兴同频共振。当青年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乡村从“帮扶对象”升华为“价值实现场域”，青春力量才能真正转化为振兴动能。这不仅是组织机制的创新，更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11]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回应。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共青团组织通过制度创新与价值引领的双重赋能，正在书写青年与乡村共生共荣的文明篇章——这既是实践探索，更是文明自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5-01(0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3-25.
- [3]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3-07(02).
- [4] 习近平. 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9-29(01).
- [5]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5: 5-20.
- [6] 刘玲玲. 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 当代农村财经, 2024, (06): 50-52.
- [7] 王胜利, 刘姣姣. 新闻媒体助力乡村振兴模式创新研究——以中国青年报“青耘计划”为例[J]. 传媒, 2021, (17): 38-40.
- [8] 豆书龙, 葛瑞琪, 马伟强等. 新时代涉农高校共青团服务乡村振兴的协同创新研究[J]. 高等农业教育, 2022(6): 41-49.
- [9] 曾博威, 刘吉春, 刘思萌. 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21, 60(22): 6.
- [10] 崔芮铭, 郭立亚. 高素质青年农民培育模式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09): 220+262.
- [11]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